

由名臣李泌看中唐的边疆经略

刘海霞

(云南大学 人文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91)

摘要 :著名宰相李泌主要活跃于唐肃宗、代宗、德宗三朝,其时唐朝转衰,战乱频仍。李泌亲历了唐朝边疆的一系列事件,这些事件反映了三朝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状况,李泌亲身参与的唐朝对边疆的决策,也反映了三朝皇帝经略边疆的观念。总体看来,三朝时期边疆政局动荡,中央政府急于平乱,然而政策上主动性不足;经济方面较为困顿,制定政策时存在着盲目的倾向;经略边疆地区的文化观念方面表现出礼与防并重,而随着局势的发展,也存在着无法坚持既有礼制的情况。

关键词 :李泌;中唐边疆;政局应对;经济策略;文化观念

中图分类号 K242.3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200(2012)04-0021-06

李泌(722~789年)是中唐名相,经历了玄宗、肃宗、代宗、德宗时代,辅佐了肃宗、代宗、德宗三朝皇帝。他一生时仕时隐,三朝皇帝都认为其智谋超凡、功高德厚、志行高远,对其委以重任,而《资治通鉴》等史书却批评其“好谈神仙诡诞”^{[1](卷233)}“及在相位,随时俯仰,无足可称”,^{[2](卷130·李泌传)}其子李繁的《邺侯家传》对其多溢美之辞。对李泌的相关史事,研究中唐历史特别是中唐对吐蕃的政策均不可略过,然而多是放在对中唐政治的分析中,也有不少学者将李泌史事整理出来进行分析,如齐涛将李泌隐士的一面进行了勾勒,^[3]何敦华^[4]、沈世培^[5]、卢华语^[6]、马亮宽^[7]、刘晶^[8]对其在中唐政局中的作用进行了相关分析,陈宏对^[9]、李向平^[10]解析了李泌充满智慧与无奈的一生和由此折射的封建专制的弊端,韩文奇考证了《相国邺侯家传》中李泌记事的正确性,^[11]徐冲等考证了李泌任杭州刺史的时间,^[12]崔明德从民族关系的角度解析了李泌的思想,《中国奇人丛书》专辟一书讲述李泌一生的仕隐浮沉^[13]等等。以上这些成果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借鉴,然而关注的都只是某一方面,系统梳理李泌与中唐边疆经略的成果尚不多见。本文试由与李泌相关的事件对中唐的边疆经略进行探讨。

一、李泌与其时之边疆

李泌,字长源,赵郡中山(今河北省定州一带)人,唐开元十年(722年)生,是“西魏太保、八

柱国司徒何弼之六代孙”,^{[2](卷130·李泌传)}其父李承休曾担任过吴房令。李泌幼时就能作诗文,七岁时曾得唐玄宗赞赏,与宰相张说、张九龄等人成为忘年之交。长大后,喜欢钻研道教玄门,曾游历嵩山、终南山、衡山,几度入朝参政。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发生后,唐玄宗远走巴蜀,太子李亨被将士和百姓挽留,在灵武郡即位为肃宗。李泌受邀从河南嵩山赶来相助,任侍谋军国、元帅府行军长史,成为灵武中兴的首功之臣。肃宗之后的代宗对李泌也十分器重,先后任命其为江西判官、澧州刺史、杭州刺史。由于内部争权激烈,李泌趋利避害,始终未接受宰相之职,但实际上起到了宰相的作用。德宗时期李泌再次得到重用,先后担任左散骑常侍、陕虢都防御水运使、陕虢观察使、检校礼部尚书、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职,受封邺县侯,以宰相身份直接参与处理唐朝的内外事务。

中唐时期,与唐朝联系较多的边疆民族或政权主要有:吐蕃、南诏、回纥(后称回鹘)、于阗、党项、奴隶、羌、黑水靺鞨、粟末靺鞨(后建立渤海)、室韦、契丹、奚、新罗、倭国(日本)、流求等。对中唐的边疆经营来讲,北部的回纥、西南的吐蕃和南诏至为重要。大致来看,回纥与唐朝的关系较为密切,虽然唐朝为笼络回纥付出很大代价,但安史之乱中回纥军队在助唐平叛中立下功劳。吐蕃在唐太宗时期开始称雄青藏高原,安史之乱后势力发展很快,逐渐控制了西域、陇右地区,成为唐朝的劲敌。

收稿日期:2012-03-15

作者简介:刘海霞(1980-),女,河南睢县人,云南大学中国边疆学专业2010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边疆历史研究。

为了抵御吐蕃,唐朝扶植南诏,取得较好效果,然而强大起来的南诏最终坐大,割据西南地区,后来投靠吐蕃,成为唐朝的一大威胁。中唐与回纥、吐蕃、南诏之间的关系,直接影响了唐朝中期边疆态势的发展。由李泌所经历的与边疆有关的史事,可以窥知中唐三朝边疆格局的演变及唐朝的治策。

二、边疆政局应对:消极平叛

李泌参政之初首先遇到的是如何应对安史之乱。安史之乱发生后,政局动荡,李亨于危急之中即位,希望通过努力平乱来挽救危局。他面对安史乱军非常焦急,曾向李泌询问何时才能破贼,然他并未按照与李泌商议好的计划开展军事行动,时机不成熟即开始收复两京:

因从容问破贼期,对曰:“贼掠金帛子女,悉送范阳,有苟得心,渠能定中国邪?华人为之用者,独周挚、高尚等数人,余皆胁制偷合,至天下大计,非所知也。不出二年,无寇矣,陛下无欲速。”帝然之。会西方兵大集,帝欲速得长安,曰:“今战必胜,攻必取,何暇千里先事范阳乎?”泌曰:“必得两京,则贼再强,我再困。且我所恃者,碛西突骑、西北诸戎耳。若先取京师,期必在春,关东早热,马且病,士皆思归,不可以战。贼得休士养徒,必复来南。此危道也。”帝不听。^[14](卷139,李泌传)

中唐吐蕃势力强盛,李泌也多次参与处理与吐蕃有关的事务。唐德宗时,宰相张延赏处理政事令臣民大失所望,然而德宗对其非常器重,将其与李泌并重,令其主管吏事,而张延赏中伤李晟、马燧等大将,使得唐德宗对这些良臣不满,这样正中吐蕃的离间计,幸赖初任宰相的李泌全身以保:

初,吐蕃尚结赞恶李晟、马燧、浑瑊,曰:“去三人,则唐可图也。”于是离间李晟,因马燧以求和,欲执浑瑊以卖燧,使并获罪,因纵兵直犯长安,会失浑瑊而止。张延赏惭惧,谢病不视事。

李泌初视事,壬寅,与李晟、马燧、柳浑俱入见……泌曰:“愿陛下勿害功臣。臣受陛下厚恩,固无形迹。李晟、马燧有大功于国,闻有谗之者,虽陛下必不听,然臣今日对二人言之,欲其不自疑耳。陛下万一害之,则宿卫之士,方镇之臣,无不愤惋而反仄,恐中外之变不日复生也!”上曰:“朕始闻卿言,耸然不知所谓。及听卿剖析,乃知社稷之至计也!朕谨当书绅,二大臣亦当共保之。”晟、燧皆起,泣谢。^[1](卷233)李泌曾经阻止了中唐一次重要的领地割让。兴

元元年(784年),为了助讨叛乱的朱泚,唐朝向吐蕃借兵,并许诺事成之后把伊西、北庭之地割让给吐蕃。朱泚叛乱平定后,吐蕃来取两地。德宗准备答应吐蕃的要求,被深知两地重要性的李泌谏止:

帝业许,欲遂与之。泌曰:“安西、北庭,控制西域五十七国及十姓突厥,皆悍兵处,以分吐蕃势,使不得并兵东侵。今与其地,则关中危矣。且吐蕃向持两端不战,又掠我武功,乃贼也,奈何与之?”遂止。^[14]
(卷139,李泌传)

为了对抗不断侵唐的吐蕃,李泌曾经提出了著名的“困蕃之策”。他详细审视边疆形势,认为回纥可以招抚,而吐蕃趁唐安史之乱,攻陷了河陇地区几千里地,还领兵进入京城,致使代宗流亡陕州,这是一定要报的仇怨。南诏自汉代以来臣属朝廷,因杨国忠侵扰,才使得其背叛唐朝投向吐蕃,若招抚则是断了吐蕃右臂。于是李泌向德宗提出了“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如此,则吐蕃自困”^[1](卷233)的策略,且犯言直谏15次,使曾受辱于回纥的德宗放下心结,这一策略得以成功实施。

以上史事与回纥、吐蕃、南诏、大食、天竺等有关,它们位于唐朝的边疆,对唐朝的政治意义重大。由这些事件,结合唐朝的内外形势,我们可得出以下结论:

(1) 安史之乱后,唐肃宗急于平乱,没有认识到安史乱军的特殊性,也未做出长远的战略规划。

安史之乱的爆发是中唐边疆政治局势的集中反映,安史乱军中包括有突厥、契丹、奚、回纥、仆固、同罗、靺鞨、室韦等少数民族将士,^[15](P351)而从李泌的分析来看,来自边疆不同地区的边疆民族首领是安禄山、史思明较为信赖的主要力量,但这些首领并不都是主动反叛唐朝的。若正确引导边疆将士,按照迂回包抄的策略,就能从根本上平定安史之乱。然而这一策略被急于创造历史功绩的唐肃宗否定了。

(2) 吐蕃周边的诸政权是唐用于牵制吐蕃东进的主要力量,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回纥与南诏,而中唐三朝对联络回纥与南诏较为被动。

吐蕃取河西、陇右后,从地缘政治上讲,与唐朝腹心地区已无任何缓冲地带,双方军队处于直接对峙中。^[16]从代宗时期吐蕃与回纥联合进犯唐朝这一点来看,吐蕃此时颇为重视与回纥交好,借助回纥的力量对唐作战具有更充足的把握。而南诏也是吐蕃着力争取的力量,吐蕃趁唐讨伐南诏的时机,拉拢南诏并进行了册封。相比吐蕃,中唐三朝对回纥与南诏的策略则显得被动。唐德宗由于个人恩怨,

迟迟不愿与主动示好的回纥恢复友好，南诏数次向唐表示希望得到安抚，不然就投奔吐蕃，“抚我则后，虐我则仇”，^{[17]（P138）}却未引起唐朝足够的重视，唐反而持续讨伐南诏。

（3）边疆民族的军队在生活习性上有特殊性，一些政权会在迂回中求取利益，中唐三朝对这些特征的把握并不充分。

前引李泌分析的西域兵士耐寒而惧热、不适宜长期待在中原的特征，就是边疆军队特殊的一面，但并未引起肃宗的警觉。及至代宗时期，从四镇和其他边疆地区来的兵士果然积劳成弊发生叛乱。而对于南诏“彼不得所即叛来，此不得所即背去”^{[18]（P1284）}虽然有基本的判断，但是三朝统治者实际操作的时候，往往不够重视，招抚或征伐的灵活性不够，认识不到叛服背后深刻的背景和文化观念的作用。

三、边疆经济策略：困顿盲行

中唐三朝都面临经济上的困窘，与常年战乱和粮食生产不足有关，但也暴露出唐朝自身的一些弊端，三朝采取的经济策略大致相同，即重视东南地区的粮食调配，经济措施与防范吐蕃紧密结合在一起。然而与政治局势上的消极平叛相对应，三朝的经济策略也时时显示出被动性，经济上的困窘也加大了政治上的危机。

李泌曾经力保了江东奉粮的大臣韩滉。兴元元年（784年），有谣传称镇抚江东的大臣韩滉有谋反意图，“以缮治石头城，人颇言有窥望意，虽帝亦惑之”。^{[14]（卷126，韩滉传）}德宗询问李泌，李泌说韩滉在德宗出行的时候一直保障后方供应，多年驻镇江东，功劳很大，为官清明。但德宗仍不信，李泌就以全族百余人的性命作保，坚信韩滉无罪：

泌退，遂上章，请以百口保滉。……上曰：“善！朕深谕之矣。”即下泌章，令韩皋谒告归觐，面赐绯衣，谕以“卿父比有谤言，朕今知其所以，释然不复信矣”。因言：“关中乏粮，归语卿父，宜速致之。”皋至润州，滉感悦流涕，即日，自临水滨发米百万斛，听皋留五日即还朝。皋别其母，啼声闻于外。滉怒，召出，撻之，自送至江上，冒风涛而遣之。既而陈少游闻滉贡米，亦贡二十万斛。^{[1]（卷231）}

德宗最终接受李泌的意见安抚韩滉，韩滉立即发米百万斛，令其子冒风涛送到长安。之后江南的陈少游听说韩滉贡米，也上贡20万斛。

贞元二年（786年），关中地区粮食库存告罄，禁军开始混乱，李泌及时上奏江淮的韩滉运来米三万斛已至陕州，唐德宗欣喜地告诉太子：“米已至

陕，吾父子得生矣！”^{[1]（卷232）}

关东防御吐蕃的兵马大量集结，朝廷的用度不够充足，于是贞元三年（787年）李泌上奏请求颁布诏旨，赦免地方官在平乱中私收钱粮的错误，令他们按例将多余的钱粮输送到京城：

请遣使以诏旨赦其罪，但令革正，自非于法应留使、留州之外，悉输京师。其官典逋负，可征者征之，难征者释之，以示宽大。敢有隐没者，重设告赏之科而罪之。^{[1]（卷232）}

唐肃宗时，由于战争的严酷，宫中用度控制严格，条件也异常艰苦。史载，肃宗之妃张良娣“驻灵武，产子三日，起缝战士衣，太子敕止，对曰：‘今岂自养时邪？’玄宗赐给张良娣七宝鞍，李泌不惜与张良娣结下仇怨，建议将鞍上的珠玉充公，以赏给有战功的人，“上皇在蜀，以七宝鞍赐后，而李泌请分以赏战士”。^{[14]（卷77，肃宗张皇后传）}

李泌还采取了一些节流的方法来减轻财政负担。如自天宝年间以来，安西、北庭的奏事人员和西域的使者来到长安，由于归途断绝，他们的人员马匹都依赖鸿胪寺供给，长安的财政负担就很沉重。李泌了解到这一情况，命令检核胡人客使，每年节省约50万缗钱：

先是，天宝末，西域朝贡酋长及安西、北庭校吏岁集京师者数千人，陇右既陷，不得归，皆仰禀鸿胪礼宾，月四万缗，凡四十年，名田养子孙如编民。至是，诏悉籍名王以下无虑四千人，畜马二千，奏皆停给。宰相李泌尽以隶左右神策军，以酋长署牙将，岁省五十万缗。帝嘉其公，擢容管经略使。凡八年，溪落安之。^{[14]（卷170）}

再如李泌还命人将丝帛重新扎染，通过党项卖与吐蕃以换取耕牛，这一措施为边疆地区耕种荒田解决粮食问题提供了途径，他又建议募集人们交纳粮食，以换取边疆官员原本空缺的职位，保证边地粮食供给：

“……今吐蕃久居原、兰之间，以牛运粮，粮尽，占无所用，请发左藏恶缯染为彩纛，因党项以市之，每头不过二三匹，计十八万匹，可致六万馀头。又命诸冶铸农器余麦种，分赐沿边军镇，募戍卒，耕荒田而种之……”上曰：“善！”即命行之。泌又言：“边地官多阙，请募人入粟以补之，可足今岁之粮。”上亦从之，……既而戍卒应募，愿耕屯田者什五六。^{[1]（卷232）}

从以上所举与李泌相关的事件可以看出中唐经

济状况,并可得出以下结论:

(1) 中唐三朝的经济状况非常困窘,边疆地区的粮食生产需要借助于其他边疆民族政权的力量。

在此情况下,一直依靠官府给养的边疆军士的情况可想而知。皇帝采纳李泌命人将丝帛重新扎染,通过党项人将它们卖给吐蕃人换取耕牛的办法来解决边疆驻军的粮食危机、实行屯田,以边疆官位换粮食和置换官员来保证粮食供应,在当时确实都是切合实际的方法。

(2) 中唐三朝平定叛乱虽然以东南物资为重要军事补给的来源,但对东南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经营缺乏稳定性。

江淮等东南富饶多产地区,是唐朝确保战争物资的后方。安史之乱后,关中腹心地区的粮食供应远远无法达到军事需要。王夫之《读通鉴论》强调东南地区对于中唐政权巩固的重要性:“唐立国于西北,而置根本于东南”,虽然频遭大乱而“终不倾者,东南为之根本也”。这样的筹粮措施必然会对东南形成重压,因而东南地区应受到重点的保护。然而从李泌以家族百余口的性命担保韩滉一事来看,至少在德宗时期,唐对东南重要的官员缺乏信任,对于江淮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经营缺乏稳定性。

(3) 三朝经济较困顿,而边疆民族或政权对唐朝的经济需求较大,防御边疆叛乱所需经费也多,唐朝对一些经济事务的处理不当,导致情况更加糟糕。

从李泌对胡人客使和地方官私粮的整顿来看,唐朝自身还存在经济措施欠妥之处。此外,在李泌生活的时代,中唐对暂时无法控制的边疆政权或民族实行经济贿赂的政策,如回纥、吐蕃,但这一措施只能在短时期内缓和双方关系,而且副作用较大。“时回纥有助收西京功,代宗厚遇之,与中国婚姻,岁送马十万匹,酬以缣帛百余万匹。而中国则力屈竭,岁负马价。”^{[14](卷51)} 绢马贸易对回鹘是极为有利的,可以满足回鹘贵族对缣帛的需要,有利于其向西域开辟市场,刺激畜牧业发展,^[19] 然而相应地,虽然唐朝利用回纥收复了两京,给回纥的赠物也已经成为唐朝的严重负担。

四、经略边疆的文化观念:礼防并举

在与李泌有关的史事中,关乎中唐与边疆文化交流的记载较少,然而以下事件仍能看出中唐经略边疆地区的一些基本文化观念。与中唐三朝的政治、经济形势和治策相联系,在处理边疆问题上,三朝统治者也持有与战争和局势相适应的文化观念。

李泌重视实际的军备,冷静并恰当地处理边疆的传言。

咸阳人或上言:“臣见白起,令臣奏云:‘请为国家捍御西陲。正月,吐蕃必大下,当为朝廷破之以取信。’”既而吐蕃入寇,边将败之,不能深入。上以为信然,欲于京城立庙,赠司徒。李泌曰:“臣闻‘国将兴,听于人。’……且白起列国之将,赠三公太重,请赠兵部尚书可矣。”上笑曰:“卿于白起亦惜官乎!”对曰:“人神一也。陛下悦不之惜,则神亦不以为荣矣。”上从之。^{[1](卷233)}

前述李泌极力劝说德宗放下与回纥的往日仇怨,可以看出中唐坚持礼制的状况。这一仇怨的缘起为,宝应元年(762年)时为雍王的德宗,被以“叔父”自称的回纥首领要求当众拜舞,雍王属下魏琚、韦少华等按照“君臣”的礼节与之论争而遭鞭笞,因受伤过重而次日身亡,后来唐肃宗强行压制了唐朝军士复仇的怨气:

诏以雍王为天下兵马元帅,进子昂兼御史中丞,与右羽林卫将军魏琚为左右厢兵马使,中书舍人韦少华为元帅判官,御史中丞李进为行军司马,东会回纥。敕元帅为诸军先锋,与诸节度会陕州。时可汗壁陕州北,王往见之,可汗责王不蹈舞。子昂辞曰:“王,嫡皇孙,二宫在殡,礼不可以蹈舞。”回纥廷诘曰:“可汗为唐天子弟,于王,叔父行也,容有不蹈舞乎?”子昂固拒,即言:“元帅,唐太子也,将君中国,而可汗舞蹈见可汗哉?”回纥君臣度不能屈,即引子昂、进、少华、琚擄之百,少华、琚一夕死,王还营。官军以王见辱,将合诛回纥,王以贼未灭止之。^{[14](卷217·回鹘传上)}

由于李泌的积极运作,回纥与唐终于交好,且可汗以子婿的身份对唐德宗恭敬地上书。德宗对于上书和接待回鹘公主的礼节非常重视,还特意询问李泌接待回鹘公主的级别,李泌强调,肃宗时以敦煌王为从祖兄,回鹘女子嫁给敦煌王,前来朝见,肃宗以“妇”而不以“嫂”来称呼。其时正值兵乱,肃宗还是维持君臣礼节,当今更应当按照君臣之礼来接待回鹘公主:

帝欲飧回鹘公主,问礼于李泌,对曰:“肃宗于敦煌王为从祖兄,回鹘妻以女,见帝于彭原,独拜廷下,帝呼曰‘妇’而不名‘嫂’也。当艰虞时,方藉其用,犹以臣之,况今日乎?”于是引回鹘公主入银台门,长公主三人候诸内,译史传导,拜必答,揖与进。帝御秘殿,长公主先入侍,回鹘公主入,拜谒已,内司宾导至长公主所,又译史传问,乃与俱入。至宴所,贤妃降阶俟,回鹘公主拜,贤妃答拜。又拜召已,

由西阶升，乃坐。有赐则降拜，非帝赐则避席拜，妃、公主皆答拜。讫归，凡再飧。帝又尽建威安公主官属，视王府。以嗣滕王湛然为昏礼使，右仆射关播护送，且将册书拜可汗为汨咄禄长寿天亲毘伽可汗，公主为智惠端正长寿孝顺可敦。^[14]（卷217·回鹘传上）

由此可见，唐德宗最终以唐朝长公主为先、回鹘公主稍后的次序安排回鹘公主拜见，且严格按照相关制度执行使者、册封等礼仪，以维护国威。

由以上史事可知，中唐三朝的边疆文化经营与观念有如下特征：

（1）对边疆的文化经营更加注重实效，以保证军事行动的开展。

从李泌对白起祠庙的处理方式可以看出，对于边疆之事，李泌更注重实际效果，奖励边将，而不是相信虚无缥缈的传言，这种观念无疑更能鼓励边将以实际军功报效朝廷。李泌对于天命有着务实的理解，“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盖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则礼乐刑政皆无所用矣”。^[11]（卷233）由“史言李泌能引君当道”，^[20]不难推断这样的观念对于中唐三朝制定决策有重要影响。

（2）边疆民族或政权与唐朝的交流更加深入，但中唐三朝统治者对边疆政权防范心较重，尤其是唐德宗对回纥的某些措施失当，使得这种交流更显被动。

自玄宗末期，以吐蕃为代表的边疆政权与唐之间战事频仍，但边疆民族或政权与内地的交流一直没有中断，而且随着战争或交好的进行，彼此还加深了了解。但也应看到，唐朝对于具体事务的处理仍较滞后，对边疆政权的猜忌和防范也昭然可见。德宗迟迟不愿与回纥交好，宁愿结好吐蕃以打压回纥，这使得唐与回纥之间的关系一度非常紧张。

（3）重视“理”与“礼”，对边疆政权或民族坚持君臣礼制，但随着形势的发展，也有不得已而违背礼制的情况。

德宗向李泌问礼，一方面是对礼制的咨询，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德宗对于应对回纥信心不足。德宗任雍王时期受辱之事，按照唐朝的君臣之礼，回纥鞭笞唐臣致死本应该得到惩罚，而肃宗却认为安史之乱尚未平定，强行压制了将士想要讨伐回纥的举动。从这些事看来，中唐的“理”与“礼”在时局变化时也显示出脆弱的一面。

五、余论：时臣李泌与中唐边疆大势

李泌在中唐三朝历史上有重要地位，我们可从德宗与李泌的对话窥知一二。

德宗曰：“……朕问难往复，卿辞理不屈，又无好胜之志，直使朕中怀已尽屈服而不能不从，此朕新以私喜于得卿也。”泌曰：“陛下能用相尚多，今皆不论，何也？”上曰：“彼皆非所谓相也。凡相者，必委以政事，如玄宗时牛仙客、陈希烈，可以谓之相乎！如肃宗、代宗之任卿，虽不受其名，乃真相耳。”^[11]（卷233）

王夫之也对李泌有甚高的评价，说他“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乃可以为天子之大臣——李长源当之矣”。^[21]（卷23·肃宗四）李泌的数次出仕，帮助造就了灵武中兴和唐德宗时期的相对稳定，虽没有最终改变唐王朝的颓势，却尽力保持了稳定，延缓了唐朝的衰亡。

通过上述与李泌相关的诸多事件，可以看到中唐三朝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状况以及边疆经略的得失。政局方面，中唐三朝与边疆民族或政权的关系总体上比较紧张。为了平复安史之乱，向边疆民族或政权调集军队，也为了对抗吐蕃，与回纥、南诏交好，然而对于边疆民族或政权的认识又不足，具体措施显现出被动性；中唐三朝的边疆经济状况较为严峻，经济秩序不稳定，漏洞较多。李泌参与制定的经济政策，切合实际并能有效施行，然而仅为应急，摆脱经济困窘于中唐非朝夕之事；中唐三朝时期与边疆民族或政权的文化交流更加深入，方式上更加务实，但随形势的变化，也有不得已而违背既有礼制的情形。李泌的相关史事，透露出中唐政治、经济、统治观念各方面的状况，也为后人细节化地了解中唐历史提供了一个角度。

注释：

崔明德、马晓丽：《隋唐民族关系思想史》，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04-206页。类似分析见崔明德先生的另一著作《隋唐民族关系探索》，第291-294页，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4年。

代宗广德元年（763年），吐蕃率领吐谷浑、党项、氏羌共二十余万的部队顺利突破关中防区，占领长安，立故邠王守礼之孙承宏为帝，剽掠府库市里，焚间舍，据城十五日退兵，代宗流亡陕州。事见《资治通鉴》卷二二三，广德元年十月，第7151-7152页。

建中三年（782年）唐朝将领张光晟杀了回纥的突董等人，唐德宗以为回纥会打击报复，便准备与回纥绝交。而回纥可汗顶着民众仇恨的压力释放了唐使，不愿意“以血洗血”，希望能“以水洗血”，主动向唐示好，这本是恢复交往的机会，唐朝却只是“以帛十万匹、金银十万两偿其马直”。事见《旧唐书》卷一二七《源休列传》，第3575页。

“四镇、北庭兵远赴中原之难，久羁旅，数迁徙，四镇历汴、虢、凤翔，北庭历怀、绛、郾然后至邠，颇积劳弊。及徙泾州，众皆怨诽。刀斧兵马使王童之谋作乱，期以辛酉旦警严而发。前夕，有告之者……及旦，捕童之及其党八人，皆斩之。”事见《资治通鉴》卷二二四，大历三年十二月，第 7205 页。

参考文献：

- [1] (北宋)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 中华书局点校本, 1956.
- [2] (后晋)刘昫. 旧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点校本, 1975.
- [3] 齐涛. 唐代隐士略论[J]. 山东大学学报, 1992(1): 47-52.
- [4] 何敦华. 试论李泌在稳定中唐政局的作用[J]. 历史教学, 1986(2): 20-23.
- [5] 沈世培. 李泌与平定藩镇割据[J]. 铁道师院学报, 1998(2): 81-84.
- [6] 卢华语. 略论李泌[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1986(1): 80-85.
- [7] 马亮宽. 李泌与中唐政治[J]. 历史教学, 1995(10): 43-47.
- [8] 刘晶, 吴艳玲. 匡扶中唐政局的李泌[J].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 1999(6): 62-63.
- [9] 陈宏对. 李泌简论[J]. 淮南师专学报, 1999(4): 47-50.
- [10] 李向平. 难为中兴却能免祸全身的从政智慧——论唐中期政治家李泌[J]. 上海大学学报, 1991(4): 33-38.
- [11] 韩文奇. 李繁生年及其《相国邺侯家传》考辨[J]. 兰州大学学报, 2005(5): 43-47.
- [12] 徐冲, 林正秋. 李泌刺杭日期考[J]. 杭州师范学院学报, 1994(2): 86-88.
- [13] 宁欣. 朝野双栖——唐代奇相李泌(《中国奇人丛书》)[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6.
- [14] (北宋)欧阳修, 等. 新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点校本, 1975.
- [15] 崔明德. 隋唐民族关系探索[M]. 青岛: 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 1994.
- [16] 邵明华. 安史之乱后唐朝京西北边防线的重建和巩固[J]. 社会科学辑刊, 2007(6): 172-177.
- [17] (唐)樊绰. 云南志卷十[A]. 向达. 云南志补注[Z].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5.
- [18] (唐)张九龄. 敕吐蕃赞普书[A]. 全唐文卷二八七[Z].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 [19] 李丽杰. 回鹘助唐平安史之乱述论[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 2002(6): 56-59.
- [20] (南宋)胡三省. 资治通鉴音注[M]. 北京: 中华书局点校本, 1959.
- [21] (清)王夫之. 读通鉴论(下)[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The Borderland Strategies in the Middle of the Tang Dynasty Reflected by the Famous Feudal Official Li Mi

LIU Hai-xia

(Humanities College,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China)

Abstract: The feudal minister Li Mi was famous in Tang Suzong, Daizong and Dezong periods when the wars broke out frequently and Tang Dynasty was in a decline. Li Mi experienced a series of events in the frontiers of Tang, which mirrored the political, economic, cultural, and many other aspects of the situation in those periods, and Li Mi participated in the decision-making on the border area of the three Tang emperors, which reflected the frontier management concept of the emperors. In brief,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the frontiers was volatile and the emperors were hasty in counterinsurgency, nevertheless the policies was passive; the economy was stuck, and a blind tendency existed in the course of making policies; the concept of the frontier management showed the both value of ritual and precaution, however, the violation of ritual appeared with the change of situation.

Key words: Li Mi; the frontier of the middle Tang Dynasty; the political strategy; economic tactics; cultural concept

(责任编辑 杨永福)